

資本和劳动

車尔尼雪夫斯基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606.3/12 15

資本和劳动

車尔尼雪夫斯基著

季 謙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一九五八年·北京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И ТРУД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0 年版“车尔
尼雪夫斯基哲学选集”(三卷集)第二卷译出。

資 本 和 劳 动

〔俄〕車尔尼雪夫斯基著

季 謙 譯

生活·讀者·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开本 350×1168 公厘 $\frac{1}{32}$ ·印张 $2\frac{1}{4}$ ·字数51,000

1953年6月第1版

195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 定价(9)0.32元

統一書号4002·137

校对者：張 羽

資本和劳动^①

《政治經濟学原理》，伊凡·高尔洛夫著。

第一卷，聖彼得堡，一八五九年。

讀者知道，对于那种因不应得的运气而迄今被認為是我們全部科学唯一和完全代表的政治經濟学体系，我們并不十分热心表示敬意。如果我們說高尔洛夫^②先生一步也不敢离开这个体系，讀者就可能推测本文将含有对高尔洛夫先生的大作的激烈攻击。不，——我們認為这本书还不配获得这样的命运或这样的注意。

高尔洛夫先生闡述的是我們所不同意的体系；但正如从各方面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坚持这个体系，只是由于知道整百年来在一切書籍中已經得到解释的东西，要比精通出現还不很久的概念容易得多。洛蒙諾索夫是个伟大的作家，——有誰不知道？而果戈理也是伟大的作家，这一点还远不是每个人都能了解的。如果有

① 《資本和劳动》一文写成于一八五九年年終，刊載于同时代人一八六〇年第一期上。

《資本和劳动》一文的内容远远超出了評論俄国庸俗经济学家高尔洛夫一書的范围。車尔尼雪夫斯基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在本文中闡明了自己的經濟学說的基本原理。他称这个学說为“劳动人民的經濟理論”。关于車尔尼雪夫斯基这篇論文，彼特拉雪夫斯基小組参加者、詩人亚·帕列謝耶夫在給杜勃洛留波夫的信中写道：“尼古拉·卡符里洛維奇这篇多么惊人的論文！簡直太令人高兴了。如果誰讀完这篇論文后还拥护那些宣传自由放任的經濟学家，那么这就是說，他有顆像科罗波契卡女地主一样构造的脑袋。”（一八六〇年二月十二日的信）

本版內的文章系根据《同时代人》原文刊印。——編者

② 伊凡·雅柯夫勒維奇·高尔洛夫（一八一四——一八九〇）——彼得堡大学政治經濟学与統計学教授，俄国庸俗經濟学家。——譯者

人总是談論洛蒙諾索夫而不重視果戈理，只是因为他出生“在当代”，要了解果戈理就必須注意文学，而不是出生在果戈理的名望得到公認的五十年之后，那么为什么要攻击这个人呢？这不过是一个落后的人罢了；落后性在敏感的心灵中所引起的，应当是怜悯，而不是憤怒。

我們認為沒有必要責備高尔洛夫先生的大作；也許我們还打算称赞它一下，但無論我們怎样努力搜罗書中可以贊美的材料，搜罗到的却不多。書的敘述不很坏，但無法称它是一本好書，因为它既枯燥，又乏味。在高尔洛夫先生奉为导师的那些人那兒被認為是糟糕的思想，在高尔洛夫先生这里並沒有。可是，也沒有一絲一毫新鮮或独立的思想，——而我們是可能希望發現那怕是两三点这样的思想的，因为甚至高尔洛夫先生所隶属的那个学派也不無某种(温和的)新鮮性和某种(瑣碎的)独立性。至于學問，那我們可找不到。有一些从罗雪尔、拉烏^①、穆勒、麦克洛克那兒剽窃来的东西，这表明作者是熟悉这些著作家的；但他們的書籍还不是一种已經足以抬高熟悉它們的人的地位的稀有物。显然，高尔洛夫先生的主要資源是希約曼^②的《政治經濟学辞典》，——不用說，这是一本好書，但其使命完全不是用作科学著作的源泉。能贊美高尔洛夫先生些什么呢？难道称赞語調的平靜、温和和謙遜嗎？事實上，在枯燥無味的敘述下，这并不构成一个特殊的优点，反而只應該被認為是貧乏的后果；但算了吧，我們姑且称赞他的大作缺少过份的奢望吧。

說它沒有微妙之处，这就意味着我們不打算抨击高尔洛夫先生的大作，因为就其一切可尊敬方面而言，它并不值得去注意。也有一些相当多疑的讀者，他們要求对一切东西都加以証明。高尔洛夫先生此时無疑会屬於这些讀者之列。“您說拙著不值得注

意，——那就請您証明这一点。”这是可能的。为了不要走得很远，我們且把《政治经济学原理》一書的序言拿来作为証据。这就是証据，完全够了。信我們話的讀者可能忽略这段引文，因為我們預先告訴过他，在这本書中他将找不到任何值得一讀的东西。

当前在俄国提出了与人民福利密切有关的許多極端重要的問題。为了明确自己对这些問題的認識，社会便轉向至今在我們这里仍被完全遺忘的科学——国家经济学。其实，这門科学虽然以前在我国書籍中未被探討过，但它的原則却通过大学講授或通过研究外国著作而在不少有学識的人們中間多多少少得到传播。由于輿論的最先号召（这种輿論是被有关农业和商业中劳动自由、土地占有方式、独占和其他题目的問題所引起的），不仅在杂志上出現了專門闡述它們的專欄，甚至还創辦了由極內行的人主持的、旨在探討經濟思想的專門刊物。在当代这种趋向以及它的这些要求之下，所以用不着再为这本以闡述国家经济学原則为內容的書籍的出現辯解了。

但是，那些由于注意到現代問題而开始在这本書中寻找現今場合下的实践原則和行动方法的人，却可能弄錯了。俄国現在出現許多不同的計劃和經濟方案。但本書的任务却不在此：它和一切空洞的計劃不同，它不是某些政治經濟单方和办法的彙編。本書仅仅叙述国民經濟的自然規律，所以我們几乎能和法国經濟学家夏·杜諾^①一道說：“Je n'impose rien, je ne propose même rien, j'expose”。^②但是，正是在現在，研究这些自然規律是可以感觉到現實的要求的。而事实上，如果說由历史环境所产生的以前的人为国民經濟組織正退出舞台，那么应当知道，当国民經濟听任自然的时候它将遵循什么样的自然規律。

在这种情形下，所謂实践家們当然会責备我們观点的局限性，这种观点

① 卡尔·大維·翰里赫·拉烏（一七九二——一八七〇）——德國庸俗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譯者

② 日尔倍尔·烏尔本·希約曼（一八〇一——一八六四）——法國庸俗經濟學家。——譯者

③ 巴尔特列米·佩尔·約瑟夫·夏尔·杜諾（一七八六——一八六二）——法國經濟學家。——譯者

④ 我不強迫別人接受任何东西，甚至不提出任何东西，我只是叙述而已。——編者

滿足于旧的、被遺忘了的自由放任公式，并倚靠自然規律。而我們从自己这方面看来，認為这个公式尽管不是唯一的原则，但它是伟大的：它过去已經帶來巨大的利益，現在，当它迫使社会相信 *glebae adscriptio* ①及其他与此相似的各种人为組織是徒勞無益的时候，它每一次仍帶來巨大的利益。而自然規律是被那支配全世界的同一个伟大力量所确定的，因而就其性質而言，它們不可能是不祥的和破坏性的，對它們加以研究，这經常能成为这門極重要的科学所应有的对象。

有人告訴我們，人类不仅在自然規律影响下生活着，而且还受难着和死亡着。此話不錯；但說明什么問題呢？由于自然規律的作用，人类可能陷入不幸和使自己經濟狀況遭到破坏。这兒只說明了一点：人类必須研究这些規律，以便由此取得一切利益，并相反地避免禍患。社会抱着后一种目的而采取若干措施；但这并不是說要摒棄自由放任公式；这仅仅表明在一定場合下必須补充这个公式。如果医学肯定地指出，要維持人体的健康，必須經常用人为的方法刺激他的食欲并用同样的方法清洗他的身体，而听其自然的自然界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那么医学会是怎样的呢？然而从前的經濟制度渗透了恰恰类似医学的精神，因为它们人为地刺激社会中价值的生产和消費，而不知道社会上存在着自然規律。我們并不認為这些經濟制度是合理的，我們希望它們从以前的作用的复杂性和人为性轉向失去的淳朴和自然性。

总之，我們叙述理論，叙述国民經濟的自然規律。但是，如果理論脫离了那些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并熾热地惹起一切重視人类最重要利益的人所关心的当代的現象，理論就会是可怜的和沒有成效的抽象。科学中闡述的理論的实践意义正在于解釋这些現象。現代經濟学家麦克洛克和罗雪尔曾公正地指出，理論家的首要任务在于表达和以必要的根据来檢定当代的要求。我們在叙述經濟科学的抽象真理时，力求不忽略这一观点，因此，虽然書內并無行动的現成計劃和經濟方案，也許这种做法会給本書帶來某种特点和实践性。

現在讓我們再轉向那些疑心多端的讀者吧。他們由于自己多疑而不得不讀完我們摘引的高尔洛夫先生的序文。于是我們問問他們：对于有着这样一篇序言的書籍，应当期待什么呢？書里吹來一陣六十年代的陈腐气味，您在各种不同的書籍中至少二十遍讀

到在这几頁中所談的一切东西，——这些早就使任何人都煩透了的思想，竟以何等的陈腔濫調在叙述啊！請你注意一开头的話吧：“当前在俄国提出了与人民福利密切有关的許多極端重要的問題”——要知道，如今無論誰写什么东西——討論郊游或拉格罗娃夫人^②在模范劇場歌唱的小品文也好，討論农奴解放或新發明的生髮油的文章也好——都是用这几个字开場的。可見《政治经济学原理》一書出現在“当前”是及时的。为什么呢？也許因为它正在解决当前提出的“問題”嗎？不，它“不是政治經濟单方和办法的彙編（为什么？）——書內找不到現今場合下的实践原則和行动方法。”它只叙述，而不指示——好得很；既然如此，何必要用“当前”这一句話开場呢？如果科学只叙述事实，而不提出原則，思想将会發出何等的朽味啊！难道用这些廢話就能构成序文嗎？誰有过这种念头？倒运的讓·巴蒂斯特·薩伊曾把它当作一种手段，用来緩和那位不喜欢“思想家”阻挠他作战的拿破仑！这原是借口，是老生常談的詭計，而高尔洛夫先生却把它当做真的。您在什么地方找到过一本討論政治經濟学而不要求劳动自由和取消保护制度的書？高尔洛夫先生本人是要求这些东西的，但为什么沒有發覺他的書和序言有矛盾？——他之所以發覺不到，因为無論書的內容或序言的內容都不过是按照陈規俗例編成的。他說，如果科学能使人信服“类似 *glebae adscriptio*”的人为組織毫無成效，那就够了，——用 *glebae adscriptio* 代替“农奴制度”，这种絕妙的說法是多么謙虛啊！一八五九年四月六日和八月十一日，检查官先生替這本書簽了字，当时已經容許談論农奴制度的害处了，而高尔洛

① 依附土地。——編者

② 拉格罗娃夫人，法国女歌唱家，五十年代內曾在彼得堡的意大利歌剧院內演出。——譯者

夫先生还是不敢在書的序言中采用这一直截了当的術語，仿佛是在十五年前写的一样。难道农奴制度是人为的組織嗎？請您看一看勒·伯勒^①的著作“Les ouvriers”^②，或者甚至看一看罗雪尔的著作，——您就会知道，它产生得这样自然，就像后来雇佣工人同資本家的关系产生的情形一样。遺憾的是，某一現象的自然性完全不保証它适合于合理的經濟概念。譬如說，在古代自由民不必亲自劳动这个概念，理論上是自然而然地發展起来的，实际上是習以为常的——难道里面有好东西嗎？高尔洛夫先生讀过巴斯夏很多著作（巴斯夏曾特別頻繁地表演“人为性”这个字的变化），但高尔洛夫忘記了社会生活中根本沒有任何东西是以人为方式产生的，一切都被自然所造成，——問題不在于說“这是自然的”，而在于分析这对社会有害还是有益？要知道在一定的环境下（也就是說，当群众沒有正确經濟概念，浸透了对外国人的嫉妒，并猜測財富主要就是貨幣等等的时候），連保护制度也是完全合乎自然的現象，——但照高尔洛夫先生本人的說法，其中并無任何好东西。战争也是最自然的事情，而当群众沒有得到重新教育的时候，战争将一直是历史上最自然的事情。高尔洛夫先生跟在自己老师背后大談其自然性和人为性，但是他的老师們本人也并不是清楚地了解他們所采用的这些概念的意义的；在下面几頁，我們會比較詳細地談到这一点，而現在，我們还是只指出所有与同一个委婉的用語“glebae adscriptio”有关的和悅可亲的事实。順便提一下，“在这么多的問題被提出来的当前”，有关消灭我国农奴制度的事情正在进行着。我們这里有些人認為解放了的农民将会懶惰，不願受雇去

① 佩尔·希洛姆·弗德里克·伯勒(一八〇六——一八六七)，法国工程师和行政活动家。——譯者

② 《工人們》。——編者

耕田，于是农事将荒怠，俄国的粮食产量将因农民解放而减少。了解一下这些顾虑是否被其他国家中类似的改革的后果所证实，倒很有趣。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欧洲其他土地上农民解放的经济后果究竟如何，——高尔洛夫一点没有谈到；解放的唯一例子是英国和法国殖民地中奴隶制度的消灭，他曾详细叙述了它的经济后果。解放英属西印度的奴隶引起什么后果呢？按照高尔洛夫先生的话（第一四五页和第一四六页），引起了如下的后果。“不费很大困难就找不到工人，这对于种植场老板说来是不方便的。黑人不愿干以前的活了，而开始耕种荒地或经营小手工业，不然就游手好闲。只有巨额报酬才能吸引他们到种植场来，以致收获季节日工要得到三个、甚至四个卢布。由于缺少人手而引起的这种情况，几个月后便成为许多种植场完全停工的原因。当然，糖的生产也相应地缩减了。”然后引证了一段话（当然是从高尔洛夫先生的主要资源《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引来的），并且从那里引用了一篇统计表。照高尔洛夫先生所说，这篇统计表表明与一八二七——一八三一年，即黑奴解放前的产量相比，“糖产量逐渐减少，一八四二——一八四六年期间仅及其三分之二”。接着，高尔洛夫先生详细说明由于黑奴解放，“殖民地受到了何等的损失”。例如，按照他的说法，圭亚那的“许多种植场的价格急剧下降了”，下面这几句话包含了他的推论：“总之，由经济观点看来，并且单单指眼前的、现在的利益而言，解放是有破坏性的事情。”（第一四七页）他又根据同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政治经济学辞典》的证明，在该页和下面几页上说道：“英国占领地上暴露无遗的这些经济后果，在法国殖民地中也表现出来”，直到如今，整整十一年之内“殖民地的繁荣犹未恢复”（第一四八页）。《政治经济学辞典》是为法国公众出版的，它可以放心大胆地对他们谈起有关这个问题的任何谬论，因为在

那里，解放已經是結束的和一去不复返的事情了。但在解放問題还没有結束的社会中，作为一个为这个社会而写作的俄国作家，却不应該毫無批判地从法国書籍或具有不良傾向的小冊子中剽窃任何談到解放的有害后果的空話，因为关于这个問題的荒唐見解在我们这里可能發生恶劣的影响。如果高尔洛夫先生費神去查一下宣布解放法国殖民地黑奴的一八四八年法国立宪會議的會議报告，那么他就会知道，在《政治經濟学辞典》上写文章的那个政党乃是种植場老板們的政党，是反对解放黑奴的政党，而且他也会知道，这些可敬的人們的意見曾怎样遭到解放黑奴主动推动者謝尔赫尔^①的反駁。这时他就会懂得，法国种植場老板們申訴的不幸并非由黑奴解放产生的，而是被那些反对解放、激怒了黑奴和不願正正当当經營自己業務的种植場老板本人的荒謬行为所造成的。他这时就能評定他們对黑奴偷懶成性的申訴的正确性了。問題很简单：种植場老板不願因解放黑奴而变更在奴隶制条件下存在的工作秩序，不願像对待自由民一样地对待黑人，而願意工作时保留鞭子，用作对劳动的奖励；他們既不想付給黑奴劳动报酬，又不願把自己种植場的設備改变得如新的劳动条件所要求的那样。不言而喻，要是个普魯士地主現在还想在自己庄园里保留劳役租和笞刑，那他也会破产的。高尔洛夫先生以完全难以寬恕的輕率态度把英屬西印度种植場老板的訴苦也重复了一遍。如果他費神讀一讀英国報紙对这个問題进行过的多次辯論（譬如今年年初就有），他就会看出种植場老板对黑人不肯干活的訴苦是沒有任何根据的，——好吧，再重复一遍：是沒有任何根据的。大部分殖民地的种植場老板簡直不想付給黑人正常的薪資，——这有官方証明，若干殖民地总督亲自証实了这一点。而在有些殖民地中，那里的場主不对黑人抱敌視态度，他們像在西欧雇佣工人一样地按照自願

的協議雇佣黑人，却没有感到劳动力有絲毫不足的现象，而黑人工作的勤勉也是絕無仅有的。高尔洛夫先生沒有理由不加批判地采納《政治經濟学辞典》中的空話，沒有理由不去查一下真实的文件。至于西印度殖民地中的解放是不是真有像种植場老板所断言的、而为高尔洛夫先生所輕信地重复的那些后果呢？这个问题对我们倒是頂重要的，所以下一期《同时代人》中，我們將譯載“Edinburgh Review”《爱丁堡評論》上一篇詳細敘述了英屬西印度殖民地中事情进程的文章^②。那篇文章中引用的文件証明：还在消灭奴隶制度以前很久，殖民地的經濟衰落就开始了；衰落的主要原因就是奴隶制度的存在；殖民地的糖产量在消灭奴隶制度以前就开始縮减了；解放并没有使这种由于其他各个原因而引起的现象加剧起来；恰恰相反，它的有利結果終于克服了那些使糖产量縮减的原因的效力，自由劳动使得种植場老板有可能同其他各产糖国家进行竞争，如果这些殖民地保存奴隶制的话，那么其他产糖国家就会完全挤垮英国殖民地的生产了，——一言以蔽之，黑奴解放的后果同种植場老板們替它恶意捏造的結果完全相反，——它不是使殖民地破产，而是挽救了殖民地，使它免于作为奴隶制度后果的完全破产。

高尔洛夫先生大作告訴我們的关于解放后果的概念可以作为下面这件事的范例，即他所謂似乎“不忽略这一观点”（根据这个观点，“理論家的首要任务在于表达和以必要的根据来检定当代的要求”）这几个字，在什么程度上被他書中的内容所証实。“理論虽然不提供行动的現成計劃”，但也不應該“脫离那些在众目睽睽之下

① 維克多·謝尔赫爾（一八〇四——一八九三）——法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曾参加一八四八年革命。——譯者

② 《爱丁堡評論》杂志上的这篇文章，系由奥伯魯契夫翻譯，并被車尔尼雪夫斯基用于其《粗野百姓的怠惰》一文中，該文刊載于《同时代人》一八六〇年第二期上。——編者

進行的、并熾熱地惹起一切重視人類最重要利益的人所關心的當代的現象”這一思想，被他如此恰當地實現了，那麼是不是需要說明這種思想具有多少新鮮的和有趣的東西呢？

由此可知，高爾洛夫先生的序文是由這樣一些思想構成的，它們在五十年前也許是新鮮的玩意兒，但用來構成這本出版在“當前”的著作的序言，就會使讀者想到：除開破舊不堪的冬烘式的陳規俗套而外，他在本書中找不到任何東西。況且，如果把序言上這些諾言同本書的內容對照一下，我們就會看出，高爾洛夫先生從自己老師們那兒搜羅來一些陳舊的觀點時，並未想到它們究竟是否能被牠敘述的那個理論本身的詳情細節所證實。他反對人為性，但沒有察覺例如他所主要指的重商主義制度（“人為地刺激社會中價值的生產和消費”的“從前的經濟制度”——這些話顯然是用來評定重商主義制度的）——沒有察覺重商主義制度當時乃是最自然的現象，並且在經濟現象中從來就沒有任何人為的現象；他雖然從巴斯夏那兒剽竊來人為性這個字眼，但不知道這個字眼僅僅適用於論戰，而不包含什麼重大的意義。他答應適當地考察現實問題，但在其中最重要的問題，即解放問題上，却毫無批判地重複那些替奴隸制度辯護和埋怨消滅它的人們的虛偽斷言。

我們覺得沒有必要詳細分析一本附有這種陳腐序言的書籍。我們覺得也沒有理由抨擊這樣一本書：托天之福，它不會引起什麼注意；所以越少談它，越能顧全它的面子。

如果我們一定要把這篇文章全部用來討論高爾洛夫先生的大作本文，顯然文章會是很短的。但我們却想乘着他這本陳腐著作的問世，來談一談根據我們對經濟現象的觀點對於高爾洛夫先生所依奉的那個體系的态度。我們經常駁斥它，譏笑它，但直到現在我們的爭論和嘲諷僅和經濟生活的各個個別問題有關，即和社會

政权不干涉經濟現象的理論、否定公社土地所有制等等有关。現在我們要看一看它的一般性質如何。

如果我們說这个学派（它的學說在我們这里被唯一称为政治經濟学）的許多見解是落后的、不足徵信的和有害的，那么还完全不能由此得出結論：我們不承認这个奉亚当·斯密为开山祖的学派的許多重大原理的無可爭辯和正确的真理。例如，毋庸置疑，生产品不变的交換价值由它的生产費用所決定，而它的市場的、每天变动的价格是由供求关系所決定；也不用怀疑，劳动分工是扩大和改善生产的最有力条件之一。我們数得出許多諸如此类的原理，我們完全同意它們，但这种細微末节的清单总是不完备的，而且也会令人过份厭煩；我們認為，如果不去列举这些我們所同意的一条一款，讓我們明确自己对这种占据統治地位的政治經濟学学派的想法，發表自己对这种构成所有个别思想总的来源的基本思想的意見，反而更好些。如果我們說我們完全接受这个体系的基本思想，我們將使許多所謂經濟学家們大吃一惊。“怎么？您承認自由放任原則嗎？”——那些認為懂得自己所恪守不渝的、也就是我們經常予以駁斥的理論的所謂經濟学家們会这样詫异地說。他們还会憤然补充說：“如果这样，为什么您要替与这个原則如此矛盾的思想，譬如經濟关系的立法規定和公社土地占有的思想辯护呢？”从有关自由放任原則的这种概念仅仅得出如下的結論：所謂經濟学家們本人并不理解他們遵循的理論的基础。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向他們說清楚錯誤所在，我們应当涉及一些不单是与政治經濟学有关的思想，而且也屬於任何一門科学的一般理論的思想。讀者將看到，我們对經濟問題的观点所依据的見解中的許多見解，都有类似的性質。

指令做某一件事和力求做到某一件事的思想，总之，帶有实践

性質的思想，按其运用的广泛性而言，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具有一般意义，它們要求用于任何一定的場合下，而不拘時間和地点。例如，人务必寻求真理，做事誠实，社会务必力求确立公平合理的原則，就是这样。行动的目的受着这些原則的指示；但它們是否談到应该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一目的呢？不，它們絲毫沒有規定完成这一任务的方法。思想一經指明完成的方法，它就丧失了普遍的、無例外的适用性的性質。讓我們举完成做事誠实这一义务的方法的最一般的定义为例。这个定义就是：不撒謊。一眼就可看出这个原則不能履行。但穆其阿斯·塞伏拉曾对波塞納說：“像我这样的人，在羅馬有三百个。”他撒了謊，——因为像他那样的人只有一个；可是，当他用自己的謊言拯救了祖国的时候，誰能責备他呢？在塞爾維亞人的一支关于科索甫原野战役^①的歌曲里，塞爾維亞人派出自己的探子去偵察敌人的实力。探子們回来了；人們問他們：“土耳其軍隊多嗎？”他們回答部隊：“不多，——土耳其軍隊很少；我們能够打敗他們。”然后他們把拉沙尔王引到一边，說道：“土耳其軍隊多得數不清；要战胜他們是不可能的；我們之所以說土耳其人很少，是为了不使塞爾維亞人胆怯。”誰會責備这些探子呢？要知道他們撒了謊。如果他們對部隊說出了真話，他們就是做得不誠实。我們故意提出这种看起来似乎有着最高度無例外性的行动方法。但我們知道，当违背这一方法而形成高度忠勇行为的时候，它也遇到与人做事誠实这一普遍义务不相符合的情形。其他任何关于行动方法的原則都有更多得多的例外。是不是需要說明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規定行动方法的思想永远不能有普遍性質，而这种性質只可能屬於規定行动目的的思想呢？实际活动

① 一三八九年，土耳其人以强大的兵力同塞爾維亞人在科索甫进行决战。結果塞爾維亞人失敗，从此土耳其控制了塞爾維亞。——譯者

的目的是被人的本性所决定的，也就是被一些經常存在的因素所决定的。行动方法是依环境为轉移的因素，而环境具有時間的和地域的、多种多样的和变幻無常的性質。“做事誠实”——这是能够而且應該永远恪守不渝的，因为违背这一原則是和人类幸福相抵触，和人的天性相矛盾的；产生这一义务的条件同人分不开，正如人的身体同他本人不能分开一样。但誠实性的要求取决于每个一定情势的个别的性質；有时誠实性要求說眞話，有时要求放弃个人利益，有时它要求仇視任何一个做事不誠实的人，有时要求帮助邻近的人；做事誠实这一义务，在不同环境下被各种方法所实现，不可能把这些方法全部列举出来；我們知道，在相反环境之下这些方法甚至会具有相互矛盾的性質。在大多数情形下，几乎在任何时候（但只是几乎在任何时候，而不是絕對地在任何时候），誠实性要求恪守眞理；但我們知道，有时它却要求违背眞理^①。

現在讓我們問一問所謂經濟學家們：他們所神化了的自由放任一語究竟有什么意义，他們是想用它确定經濟措施的目的呢，还是想用它确定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当他們念出这几个字的时候，他們想說的是什么？他們是不是只說經濟措施應該力求达到人类最大可能的自由，——或者想說取消立法規定、限制和禁止是确立最好的經濟制度的唯一方法？在前一种場合下，如果这句著名的話仅仅想規定經濟措施的目的，那么这句话与那些具有普遍

① 沒有必要指出，可以容許违背眞理的場合仅仅屬於实践范围和行动生活，而不屬於思想生活和理論范围。在理論上，在研究工作中，“寻求眞理、传播眞理”的原則規定着任务、活动目的，而不規定完成这一任务的方法。所以这个原則是絕對的。但如何实现它呢？这方面又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其中任何一种方法都不能要求無例外性。有时，为眞理服务这件事，要求某些人关怀科学領域內新的研究；有时，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精力用于新的研究，反而会违背自己在眞理面前的責任。当他在群众中單純传播已被科学發現的眞理，比某种学术上的探尋对眞理能更有功績的时候，情形就是这样。——著者

性的原則的性質并無显著矛盾。应当研究一下，这个原則是不是真的正确，它是否真的构成政治經濟学探求的結果？要是不作任何研究，那么还没有理由第一眼就說它不适合賦予它的要求。但在这样的場合下，自由放任原則便失去任何規定性，一点也不能用于論战了，而这种論战性正是那些所謂經濟学家們賦予它的。于是，無論重商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限定主义者，都能同經濟学家一样地說道，他們之中每一个人的体系都是这个原則的实现。譬如重商主义者說：“經濟措施的目的就是最大可能的自由。我們認為，在禁止稅的条件下，比在以純粹財政目的的關稅限制条件下能更完備地达到这一目的。沒有禁止稅，法国居民就不可能制造蘿卜糖，而禁止稅使每个法国人都有这种可能性，从而扩大了他在經濟活动中間选择的范围，从而給予他更多的自由。”限定主义者也会說：“只有安全的人才有自由；我們規定細布的寬度，規定这种紡織物每一品种一英寸應該有多少根綫，每一品种每一匹應該有多少分量，應該按什么价格出售；这样，購買者就能免于工厂主的詐騙行为，从而得到了自由。”至于共产主义者会怎么說，——我們不打算解释。毫無疑問，經濟学家可能反駁我們所援引的限定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的議論，但是，他們只能从实际錯誤方面来駁斥它們，而不能責备它們对自由放任原則热爱得还不够，如果說这一原則仅仅規定措施的目的，而不規定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的話。他們可以說：照他們的意見，限定或禁止稅乃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于是这就很明显了，假定自由放任一語是某一个参加爭辯的理論的格言，那么它所規定的不仅是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各个經濟学派無例外地都可以接受它），而且也指出实现任务的方法。事实上，就这个意义而言，它的一切信徒們都是懂得这句话的。当他们念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們不是单单說經濟措施應該力求确立社